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李洪雷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一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我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提高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法治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法治化既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落实好这项重大战略任务，对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党内法规体系共同构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法治体系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始终把法治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考虑、来谋划、来推进，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和框架中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对标对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个总体目标确立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对标对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步骤，适应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任务，统筹谋划、一体安排、共同发力。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认识和把握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论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起着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列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遵循，具有贯通全局、覆盖全局和指导全局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提高党依法执政、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水平。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力争提出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法与时转则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及时有效回应实践发展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只有做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才能有效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此，应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尽快上升为法律；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及时修改或废止。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

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提高立法质量。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机制。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十分崇高的价值目标。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构建阳光司法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十一个坚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 方 提 尹韵公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两年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路径，将党的声音传递给群众。实践证明，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

一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绝不只是传统媒体的简单组装，而是互联网视域下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新探索，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信息传播功能。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基层群众表达意见的热忱不断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群众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情绪沟通桥梁，上接省市融媒体乃至中央主要媒体，下连千村万户。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树立互联网用户黏性思维，深度融入基层舆论生态，深刻影响基层舆论格局，增强传播力和公信力，切实发挥其畅通民意诉求的作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具有社会治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这一重要论述提示我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注重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不断构建与日益完善，技术赋能信息生产、传播与分发，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不断彰显提供了强力支撑。

二

由于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汇和网络交往频率不断增加，这对基层思想引领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其一，在基层舆论生态领域，舆论主体的多元性、传播渠道的移动化、舆论生产的情绪化，使得舆论引导和共识凝聚的难度大大增加，基层舆论生态渐趋复杂。其二，在基层智慧服务领域，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不高，“数据孤岛”与数据壁垒现象较为严重，互联互通难以有效实现；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堪忧，无法真正满足群众需求。其三，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传统政府管理以科层制树状结构为主体，政策指令自上而下执行高效，但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相对狭窄，且横向信息沟通不足，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不多，基层自治的社会化程度普遍偏低。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则起着基层社会治理枢纽的作用，它既是畅通和规范基层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的有效通道，又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直面问题，勇于创新，积极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新态势。

首先，确立目标。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相对于其他治理主体的独特优势，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社会功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场域进行有效对接，厘清县级融媒体中心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定位，找准关键场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开辟新途径。一是强化基层社会的主流舆论引导。既要做大做强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强化价值引领，又要引导民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与乡土认同感，凝聚思想共识、凝聚百姓人心。二是创新基层社会的智慧服务体系。既要让民众充分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又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决策、高效服务与精准治理。三是推动城乡社区的多元协同共治。既要激活基层民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搭建基层自治平台与交互空间，不断提升基层自治水平，又要鼓励多元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我们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三者相统一，更好联系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其次，发挥效能。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从主体性、工具性、场域性与价值性等诸方面，注重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一是主体效能。基于主体间关系维度，关注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治理主体效能，并协调和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内在联系，形成动态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网络。二是工具效能。基于平台聚合维度，强调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信息传播、价值引领、民意汇集、资源整合、智慧服务、协调沟通、组织动员等多功能聚合平台效能。三是场域效能。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现代化技术手段优势，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场景，实现智慧社会治理目标。四是价值效能。基于价值观念维度，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嵌入不同社会治理场域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最后，拓展路径。依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实需求，以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目标，努力实现信息上下沟通、资源内外链接、服务多方联通、主体多元协同。一是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提升基层社会认同，强化引导力。通过权威信源、融合生产、精准分发，扩大信息边界和内容专业辨识度，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与共识凝聚，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二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搭建基层智慧服务数据链与价值链，激活服务力。通过数据赋能，实现信息共享、信息匹配和信息互动，精准对接社会诉求，促进基层社会科学决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三是以平台优化为抓手，建立多元主体间耦合互动网络，发挥沟通力。通过平台终端深度融合与智能场景再造，优化纵横联动网络，实现上联党委政府、中通多元治理主体、下达社会公众，提升多元主体间的关系黏度与协同参与沟通能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四是以管理创新为保障，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提升组织力。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民众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机制、多元主体民主协商与协调沟通机制等，保证群众呼声能够积极反映和及时回馈，保障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作者均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洞察

自尊自信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 杨 军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在关于这一局面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中国跟美国斗是鸡蛋碰石头”“只要中国对美国让步，双方就可以重归旧好”之类的观点，其中既包含崇美、跪美的心理，也包含对中美关系及其发展的误解。破除这些心理和误解，需要正视以下几个问题。

中美关系发展中始终存在交锋斗争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交流合作与交锋斗争的交织叠加中推进的，接触加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基调。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重要责任、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些是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同时，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维护本国“绝对安全”，长期试图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持续对我进行“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这导致交锋斗争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常态。

客观全面认识中美关系，不仅要看到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一面，还要看到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霸权与反霸权的一面。美国1993年制造“银河号”事件，1999年用导弹野蛮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制造南海撞机事件，对台军售变本加厉……这一系列活动直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即便在经贸领域，两国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汇率等问题上也有长期较量，遑论本届美国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历史表明，中美一直是在交锋斗争中推进交流合作的，所谓的“旧好”其实是交锋博弈的结果。

自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持续发难，从加征关税到打压华为，从开列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实体清单”到明抢TikTok，从悍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到操弄香港、台湾、南海等议题，尽管我国努力以理性、克制态度处理问题、管控风险，但美国仍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无视规则，漫天要价，极限施压，出尔反尔，一再压缩交流合作空间，强化冲突升级趋向。在此情况下，能用委曲求全应对美国的得寸进尺吗？能以在核心利益上的无原则退让换取美国的“网开一面”吗？软弱妥协换不来尊重，敢于交锋斗争才能维护国家尊严、维系两国平等关系。

中国拥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实力和优势

崇美、跪美心理导致人们对当代中国的判断局限于“万事不如人”的预设，忽视新中国经过70多年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积累的强大力量。这些力量恰恰是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实力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赢得中国人民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珍视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对于中美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关系定位和政策选择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美国挑衅面前保持战略定力，既愿意与美方保持对话协商，开展坦率有效沟通，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紧张局面，也有坚定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坚强意志和从容面对中美关系经历风雨的思想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组织人力、物力资源；具有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实现不同地区、领域、行业相互协作配合；具有坚定的贯彻执行能力，能够确保令行禁止、使命必达；具有活跃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够根据实践检验和人民愿望，在改革中克服弊端、弥补短板。独具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坚实国力。中国经过长期发展积累，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全产业链优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日益形成；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当前，中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是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基础。

这些优势，意味着中国绝不是能轻易被打破的“鸡蛋壳”。中国所拥有的综合实力，能够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也能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美国一些政客的肆意妄为，将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在被动挨打中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和依附状态。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持续探索和艰苦奋斗，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上，从1949年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足5%，到连续十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第一；在科学技术上，由“跟跑”向“并跑”转变，并在一些领域实现“领跑”；在理念上，从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到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参与国际事务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加入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而且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气候变化治理、公共卫生、反恐、防扩散等诸多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中国成为美国眼中的“挑战者”，但也意味着中国不再是百年前任人宰割、支配的对象，不再是国际关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秉持的理念和履行的国际责任，正在改变世界面貌，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2020年世贸组织裁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征收关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77国集团与中国共同声明坚持多边主义仍然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等，都充分说明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说明中国站在国际道义一边。这同样是中国应对美国挑战的底气。

因此，认识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抛弃神化美国、迷信美国而无视中国优势的妄自菲薄。自尊而不自大，自信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才是应有态度。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